

蒙古国历史课程中的中国叙事与身份政治

柳华妮¹ 李佐腾²

1.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200083

2. 云南财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221

摘要: 历史教育建构身份认同, 亦影响邻国间认知互动和地缘心态。在自体安全视阈下, 对蒙古国教育部2019年颁布的初高中历史课程文件及相应的历史教科书进行话语历史分析(DHA), 展示出其官方叙事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策略。文本中以“文明边界”“受难与觉醒”“主权正当性”三套差异化叙事模板实现对中国的“他者建构”, 本质上是以防御性叙事机制来应对地缘压力, 虽可能巩固内部认同, 却遮蔽历史共生的事实。未来应以问题为导向, 通过教育领域对话推动叙事互惠, 为构建历史认知共生创造条件。

关键词 蒙古国; 历史教育; 历史教科书; 中国形象; 他者建构

DOI: 10.64649/yh.jydk.issn3080-2660.202604012

0 引言

2019年, 蒙古国教育部开始推行新版初高中历史课程大纲、教学指南以及教科书。课程文本呈现出对中国“他者化”的叙事特征。本研究以该版初高中历史《课程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初中历史《课程学习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及相应的教科书为核心文本进行分析, 着重探究蒙古国历史教育叙事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也为促进东北亚区域内的身份政治研究与教育领域深度对话提供参考。

1 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

传统的史学研究曾受到“农耕—游牧”二元框架的深刻影响。而近二十年中, 中国史学界开始转向以文明共生性与“多元一体”格局为重心的研究, 全球史观下的共生叙事成为主流^[1]。从秦汉时期的文明互动到清代晋商的经商历史, 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原与草原地区之间形成的商贸网络绝非单向的依赖关系^{[2][3]}。海外学者则在解析中国古代北方边疆形成的同时提出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在冲突中形成了制度性的互构关系^[4]。

后苏联时代, 蒙古国的本土历史书写经历了剧烈变化。彼时开始, 蒙古国官方重塑成吉思汗等历史英雄的过程, 目的是填补认同真空。与此同时, 面对内部部族差异和外部大国影响等多种张力, 其历史叙事常带有相当明显的防御色彩。关于二十世纪中蒙之间的互动, 国内学者对《雅尔塔协定》与外蒙古问题的外交史实做了详细梳理, 而国际学者则注意到蒙古国现代史学研究为了强调自身独立运动的法理正当性, 倾向于将清朝的统治描述为一种截然不同的、异族统治对自身文明的阻断^[5]。

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历史教科书是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载体, 是界定“自我”与“他者”边界的政治纲领。自体安全理论认为, 国家在追求生存安全的同时, 也追求自我认同的连续性, 即“自体安全”。詹姆斯·沃茨指出, 官方会使用固化的“叙事模板”来过滤和转译史实, 从而抵御认知焦虑^[6]。已经有学者对蒙古国2014版历史教科书中“古代中国”内容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指出其中主要强调游牧和农耕文明的异质性^[7]。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行三方面拓展: 研究材料更新为2019版官方课程文件及新版教科书, 直接剖析官方意志; 包含近现代叙事, 囊括完整时间跨度; 从内容描述转为话语解构理论视角, 进而尝试解读“他者化”建构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历史科目的复杂性和文本材料的多维度特征要求研究过程要同时考虑文本所处的现实语境, 以及集体记忆的塑造手段。因此, 本研究采用话语—历史分析, 在历史、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包括从微观的教科书到宏观的国际形势)识别指称、述谓和论证策略^[8], 并将该方法与叙事模板分析相结合, 重点解析文本差异化塑造“中国形象”的详细策略。

3 课程文本中的中国叙事

整体来看, 在本套历史课程体系当中, 不同历史时段中, 中国被塑造为不同的形象, 和其他历史主体一起被编入其历史教育叙事体系。蒙古国借此在历史话语场中建设起自身的身份边界, 并实现国家认同的建构。

3.1 古代史叙事中的文明边界模板

蒙古国官方课程文本中, 清代以前的古代史阶段套用了“文明边界模板”进行叙事。该

模板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显著的二重性，在被高度推崇为文明母体的同时，也被形塑为与北方游牧文明存在本质性异质的“他者”。

《大纲》和《指南》对清代之前的中国史给予了整体上的正面评价，将其明确定义为“远东文明中心”，肯定其对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例如，六年级课程“世界古代国家”主题将古代中国与两河流域、古印度、古希腊及古罗马并列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叙述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实质上是为了确立地理和文化层面的“参照系”，在差别讲述中界定自我^[6]。十至十二年级的教学要求中反复使用“分析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北方的史实”“收集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国人关系的资料，解读二者的不同特点”等表述。通过指称策略，蒙古国在概念上将自身明确指称为“游牧民族”而把“中国人”固化为单一的农耕民族，以实现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具有“多元一体”的复合特征^[2]，但蒙古国的历史课程文本将“中国人”的概念窄化为纯粹性的“农耕他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明类型鸿沟清楚地建立起来。

对古代北方游牧政权的归属，教材文本进行了泛化的叙事转译。六年级教材直接把匈奴建构为“我们蒙古人的祖先”，称鲜卑、柔然为“继承匈奴而兴起的蒙古人国家”，匈奴与汉朝的关系被描述为“以长城为界”的对等两国。此种“泛化”的叙事策略，将认同脉络向远古延伸，以确保本国历史的逻辑连续性与正当性，强烈映射出其对于本体安全的渴求。这一叙事转译过程，造成对中国历史乃至区域历史的认知偏差，缺少对东亚历史上“农耕—游牧”制度互构的深入讨论与理解^[4]。另外，元代历史包含于“成吉思汗时代”主题之下，主要知识点中仅将“大元”与金帐汗国等并列作为蒙古帝国一部分，不单列中国作为要点。叙事走向暗示中原与北方游牧文明只有简单化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由此推断，学习者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理解也可能趋向于孤立化和片段化。

3.2 清代至近代叙事

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蒙古与世界”章节，蒙古国历史课程文本的叙事基调和基本走向发生了转折，套用“受难与觉醒模板”，构建出一套以“异族压迫”与“民族自救”为主题的悲剧性叙事。

《大纲》中，清朝与外蒙古的关系统一以“满洲征服蒙古”“异族统治蒙古”来进行话语指称。八年级教材进一步具体化了这一叙事：清朝“确立了一套旨在控制与管束蒙古人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立理藩院，颁行《蒙古律例》，

“将蒙古人置于其统治之下”。教材还指出，“蒙古人既受满洲统治，便再无推行与实施独立国策的可能。蒙古土地与人民的最高主宰乃是满洲皇帝。”正如莫里斯·罗萨比（Morris Rossabi）所指出的，蒙古国史学界倾向于将清廷对于外蒙古关系的这段时期描述为自身文明的“阻断期”^[5]。频繁使用指称策略，将具体历史语境下具有高度互惠性质的复杂博弈关系简化为简单的单向控制。这种叙事方式确立了一个绝对的、对立性的“他者”，为随后讲述的政治变化做铺垫，可以激发学习者的“本体安全感”。

八年级教材第三部分详细描述：“（内地）商人向（喀尔喀）蒙古人赊销货物银两，年利率36%，限期三年内清偿债务。蒙古人多不能按期清偿，商人遂乘机将逾期利息滚入本金，延期再计三年，利上滚利。”“高利贷”在这一语境下成为核心词，并通过DHA分析中常见的论辩策略来佐证，复杂时代背景下的经济矛盾在叙事中被突出并高度地民族化，直接树立并放大群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整套课程文本在刻意忽略掉晋商等贸易群体在促进边境物资流通、建立商贸网络等领域的功能^[3]，着意将他们定义为财产的掠夺者。在历史教学和与多元文本互动的过程中，学生将会在潜意识里形成关于中国、中国商人的预设，进而形成以物质利益冲突为基础的一层认知障壁。

3.3 二十世纪叙事

进入二十世纪相关段落，叙事的重心发生第二次位移。中国的形象从清代的“压迫者”转变成国际秩序博弈中的“背景参照”。此时课程文本采用了“主权正当性模板”，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被描述为程序化的法理过程。

《大纲》“一战后的世界：焦虑的时代”主题要求基于印度独立运动、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等案例，分析“东方民族主义的复苏”。中国的“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并置，体现出互文性策略。客观地承认中国民族觉醒、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正当性，是为借此论证“民族独立”是当时全球范围内的“大势所趋”。外蒙古独立问题曾引起的历史关切因此在话语层面被消解。有关《雅尔塔协定》的部分，突出外蒙古军队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重大贡献，而后要求教学中要深入探讨英、美、苏三国首脑的会晤对于“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所产生的影响。在话语策略上强化与弱化并行，中国从话语场景逐步“失语”，成为面对国际规则时不得不让步的形象。

4 结语

蒙古国历史课程文本中使用“文明边界”“受难与觉醒”以及“主权正当性”叙事模板塑造中国形象，并随着历史叙事阶段推进而发生变化，从文明参照和农耕“他者”，到文明干扰者，再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变革中的背景元素，叙事最终指向自身民族主体性的确认。其叙事策略是在地缘政治态势中实现“本体安全”的补偿机制，在高频使用“叙事转译”的同时以今律古，

剥离历史的复杂性，意在构建认知隔离。然而，该历史教育叙事体系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并加深其民众对当代中国的疑虑，亦可能在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构成对深度互信的文化挑战。未来深化双边关系与相互理解，需要两国进行教育领域常规性的深度对话并达成谅解，更需要长期细致地研究一线历史教研、教学并开展合作，设法实现从“叙事防御”到“认知共生”的转变。

参考文献：

- [1] 马俊毅. 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46(5): 28-38.
- [2] 刘振伟, 崔明德. 先秦游牧、农耕文明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41(11): 127-136.
- [3] 张舒, 张正明. 清代走口外的晋商[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42(2): 43-49.
- [4] DI COSMO 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ROSSABI M. Modern Mongolia: from khans to commissars to capitalist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6] WERTSCH J V.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7] 刘迪南. 蒙古国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古代中国”[J]. 历史教学问题, 2020(3): 18-22.
- [8] REISIGL M, WODAK R.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DHA)[M]//WODAK R, MEYER M.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3rd ed. London: Sage, 2016: 23-61.

作者简介：柳华妮（1981—），女，汉族，山东烟台人，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副教授，研究方向：教科书研究、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通讯作者：李佐腾（1985—），男，满族，辽宁锦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教科书研究、话语理论、翻译学。

项目信息：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外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专项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学英语教材中的中国形象研究——以五邻国为例”（项目编号 2022zxkt10）成果。